



甘肃省历史学会
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 编

史学论丛

第七集

兰州大学出版社

K061
23
:7

史学论丛

第七集

甘肃省历史学会
西北师大历史系 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

史 学 论 丛

第七集

甘肃省历史学会
西北师大历史系 编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邮编:730000 电话:8617156

甘肃省委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

1997 年 6 月第 1 版 1997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60 千字 印数:1—1 000 册

ISBN7-311-01180-9/K·145 定价:16.50 元

序

——“认真地读一点历史”^①

我们中华民族以历史久而著称于世。中国共产党“一贯重视历史经验的借鉴和运用”。

甘肃省历史学会，在各级党政组织的领导和关怀下，始终坚持党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团结、率领广大历史科学工作者孜孜不倦、锲而不舍地耕耘在历史科教战线上，用辛勤的劳动撰写出了许多有份量的史学论著，为我省历史科学的繁荣和发展、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尽了一点绵薄之力。值得庆贺！

省历史学会自1978年11月正式成立以来，先后出版发行了1—6集《史学论丛》，发表会员科研成果约250余万字。现在《史学论丛》第七集，又和广大读者见面了，这是甘肃省历史学会在1996年7月平凉举行的第十四届年会上，与会代表提交的部分科研成果，其中不少篇章属上乘之作。值得一读。

江泽民同志指出：“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②

可是，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社会上在一些人中间，流传着一些偏颇不实的说法，如认为历史科学似乎是可有可无的了；还有的说什么学历史究竟有什么用处？等等。

列宁曾经指出：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毛泽东也曾指出：指导一个伟大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

江泽民同志更是明确强调指出：要“认真地读一点历史，首先要了解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为了适应扩大国际交往的需要，更好地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长处，还要了解世界的历史。”^③

因此，历史科学决不是可有可无的学科。“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④

在这里我想提出两点与同仁们共勉。

一是历史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问题。历史科学研究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导。决不能把它们看作一成不变和神圣不可侵犯的教条。列宁曾经明确说过：“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恰恰相反，我们深信：它只给一种科学奠定了基础，社会主义者如果不愿意落后于实际生活，就应当在各方面把这门科学推向前进”。因此，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历史，去说明新问题。被说明的问题越多，成就也就越大。

二是历史科学研究的着重点问题。中华民族有着数千年的光辉灿烂的历史，对世界文明进程起过巨大作用。英国著名学者贝尔纳曾经说过：“（中国）在许多世纪以来，一直是人类文明和科学的巨大中心之一”。我们炎黄子孙从古代中华文明对世界进步的重大影响中受到鼓舞，感到自豪，但也决不能就此故步自封，停滞不前。

历史科学是通过阐述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总结历史经验，帮助人们正确理解过去和现在，并科学地预测未来。

“如果不了解中国的历史，特别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史，就不可能认识和把握中国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⑤

因此，可以说历史科学工作者必须要用毕生的心血去学习、研究和掌握中国的历史，尤其是中国的近代史、现代史和我们党的历

史,以史为鉴,更好地面向现实,面向未来,面向世界,为现实服务,为祖国的现代化事业服务、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服务,这就是历史科学研究的着重点。

同时也应当看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到今天,完全摆脱了闭塞、隔离的局面、全球的距离大大缩短了,人们的联系和交往空前密切,互相之间的影响急剧加强。因此,世界各国的历史真正变成了全世界的整体历史,在这方面我们亦应给予应有的重视。这样才无愧于文明古国、世界大国的地位和作用。

这本文集,就是汇集了我省广大历史科学工作者在 1996 年内的部分科研成果,表述了各位作者学术见解的力作。为此,省历史学会特组成了编委会,并聘请了有关专家、教授,根据各自不同的专业特点,对提交的全部稿件分别一一进行了个人阅评、集体讨论入选的办法共筛选出省内 20 个单位作者的 40 篇论文,编辑成《史学论丛》第七集公开出版发行,其中包括中国古代史研究 10 篇,中国近代现代史研究 14 篇,世界史研究 8 篇,史学理论与方法研究 7 篇,其他 1 篇,书中如有不妥之处,切望专家学者、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文集在编辑出版过程中,得到了兰州大学出版社,西北师大历史系、平凉公路总段等单位,以及其他有关同志的热情帮助和支持,在此,我代表甘肃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会,一并致以衷心地感谢!

张培德

1997 年 5 月 1 日

注:①②③④⑤均见江泽民《努力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五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

目 录

序

——“认真地读一点历史” 张培德

南、北石窟最早洞窟杂考 夏 阳(1)

敦煌写本类书概述 李冬梅 寒 沁(7)

论拓跋鲜卑的迁徙与发展 王万盈 张小虎(12)

秦汉工商管理探讨 黄兆宏 马克林(22)

甘肃藏传佛教寺院及其特点 刘建丽(31)

钟存居地初探 邓全运(43)

中国“罗柯柯”风靡欧洲大陆 侯丕勋(49)

二十五史的书名称谓 汪受宽(54)

明代西北的交通与商业 李清凌 徐泽桂(61)

论杨廷和集团在大礼议中失败的原因 田 澍(76)

论近代爱国主义的历史特点 张海声(87)

左宗棠对陕甘回族安置工作述评 李 伟(94)

浅谈近代河西经济发展滞缓的社会原因 赵艳林(109)

光绪皇帝与戊戌变法 邢彦君(116)

从彼得堡谈判评曾纪泽的外交品格 郑正伟(123)

论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关系 李建国(130)

抗法保台 建设宝岛

——刘铭传在台湾的业绩 刘志荣 张维军(140)

建国后河西开发的历史启迪 赵颂尧(148)

平凉公路建设史刍议 王仲科(154)

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指针

——关于邓小平南巡谈话的思考 党庆兰(166)

历史丰碑 昭启百代

- 简析红军长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 张希仁(187)
- 试谈长征精神与长征启迪问题…………… 刘江真(189)
- 红军长征与长征立足点的确定…………… 王世雄(195)
- 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原因探析
-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六十周年…………… 李兴业(201)
- 十九世纪后期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历史因素…………… 李心洁(210)
- 美国西部开发时期的土地政策…………… 李春芳(219)
- 论林登·约翰逊的“伟大社会”…………… 杨鹏飞(226)
- 斯拉夫派研究中有争议的问题…………… 李玉君(240)
- 二战爆发前后美国欧洲政策的调整转变…………… 凌晓华(248)
- 浅谈三四十年代法西斯国家向拉丁美洲的渗透…………… 李怀顺(254)
- 1940年下半年的苏德关系论析…………… 李积顺(263)
- 试论政府在韩国经济腾飞中的作用…………… 王起亮 程翠英(274)
- 对文化生长与文化生态关系的几点思考…………… 金云峰(283)
- 中国革命运动与青年人生价值的实现…………… 张邦本(290)
- 历史教学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胡三敦(298)
- 重视发扬历史学的批判精神…………… 刘治立 张兴胜(305)
- 记忆历史知识的几种方法…………… 魏星斗(311)
- 高三历史高考能力培养浅谈…………… 焕文 纪红(317)
- 新编历史教材与实际教学的冲突…………… 车晓华(324)
- 平凉公路总段简介…………… 贺应铭(331)

附录一:甘肃省历史学会第六届理事会组成人员名单

附录二:甘肃省历史学会章程

南、北石窟最早洞窟杂考

夏 阳

关于泾川南石窟与庆阳北石窟,以前已有两项研究成果,本文在《庆阳北石窟》和《甘肃泾川南石窟调查报告》^①的基础上,试对南、北石窟最早洞窟再作一些新的探索,得札记如下,以供同行参考。

一、最早洞窟与云冈石窟因缘推测

南石窟第1窟与北石窟第165窟是南、北石窟中的最早洞窟,为北魏泾州刺史奚康生于永平二年(509年),至永平五年(512年)其任期内所开凿^②。这两窟均为大型七身立佛窟。以北石窟165窟为例,洞窟高14米,宽21.7米,深15.7米。七身立佛像高8米。其七身佛的布局大体为正壁三立像,左右壁各二立像。此立佛形态大体为褒衣博带,磨光肉髻,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作与愿印,跏趺。

此北魏七身佛的形式,在国内别处石窟中不见。但这种形式,在地处较偏远的泾水上游出现,必然非凭空自创,应有因缘,应有相似的形式作为其学习的榜样。遍查国内石窟中较有代表性的北魏七身佛组合后可见:龙门、云冈诸石窟,某些龛楣上的七身小坐佛不足与之比附,唯云冈石窟第13窟太和十八年(494年)之前^③后室前壁上一列立佛,可与之参照。云冈第13窟此列立佛有七身,均高190厘米,中间三身为一组,左右各两身各为一组。其形态为褒衣博带,磨光肉髻,右手作施无畏印,左手作与愿印,跏趺。这种组合,这种形态,最接近于南、北石窟七身大立佛形式,前者可视为

后者设计的参考模式。即古代艺术匠师可作如此变化：变云冈石窟壁面上的立佛，为南、北石窟最早洞窟中的主像；变云冈石窟第13窟七立佛之中组三身佛像，为南、北石窟最早洞窟正壁前的三身立佛像；变云冈石窟第13窟七立佛之左右组各二立佛像，为南、北石窟最早洞窟左右壁前的二立佛像。因此，南、北石窟的开创，在主要方面的造像形式上，找到了与云冈石窟的联系。

相应，在其它方面，二者仍有联系。

云冈第13窟壁面上雕凿有对称地分坐左右的交脚弥勒形象。相应地，南、北石窟最早洞窟中也雕凿了对称地分坐左右的交脚弥勒形象，布置在洞窟的前壁前。

云冈第9、10窟(494年之前)^④为一组双窟。第9窟前室北壁的明窗西壁上，雕出一乘菩萨。第10窟前室北壁拱门上部东侧雕有一护法天神，三头四臂，一手托日，一手托月。相应，北石窟第165窟门内两侧亦雕凿出乘象菩萨和三头四臂，托日月的护法天。云冈第9窟表现了大乘佛典《妙法莲华经》的内容，此经有《普贤劝发品》，其中有普贤菩萨愿乘白象，护持一切一心称诵《妙法莲华经》者的内容。故这乘象菩萨可认为是普贤。云冈第10窟拱门东侧护法天旁有山形。按佛教有阿修罗在须弥山前的说法，且此护法天并不具有其它护法天的显著特征，所以此护法天应为阿修罗天。北石窟第165窟的乘象菩萨正处在门边护持的位置上，护法天身后的壁面亦凿出山形，这说明此二形象为普贤菩萨和阿修罗天。两窟在题材上有很大的相通处。

又云冈第13窟，第10窟壁面上多有雕凿的小千佛。相应地，北石窟第165窟前壁上方亦凿出成片的千佛形象。

云冈第10窟等有浮雕的佛传，本生故事。相应地，南石窟第1窟，北石窟第165窟也有这方面的内容，浮雕于洞窟上部。

通过以上这几项内容的比较，使我们对南、北石窟寺同云冈石窟的关系的理解加深了，甚至可以推测，南、北石窟的开凿，其内容

题材,几乎全学习了云冈石窟。

因此我们又可联想到洞窟形制。南、北石窟最早洞窟的洞窟形制是否学习了云冈呢?回答可以是肯定的。因为可以推测,它照顾到七佛布局的需要,同时吸收了云冈第13窟后室横长方形,第9、10窟前室横长方形的特点而凿。它甚至带有某些云冈石窟前后室的性质,如北石窟第165窟门前,包括二天王所站的位置,似为前室或前庭。另外,南石窟第1窟,北石窟第165窟门上方壁面均开有明窗,亦如云冈石窟门上方所常见者。再者,南、北石窟最早洞窟均为覆斗顶或盝顶,这种形式亦如云冈第13窟后室及第9、10窟前室的顶部特点。因此,南、北石窟最早洞窟应推测为吸收了云冈石窟的洞窟形制因素,才形成自己的横长方形和盝顶的形制。

另外,南、北石窟的开创者奚康生是否同云冈石窟有特殊联系呢?回答也是肯定的。据《魏书》:“(奚康生)其先代人也,世为部落大人。祖直,平远将军,柔玄镇将。入为镇北大将军,内外三都大官,赐长进侯。卒,赠幽州刺史,谥曰简。父普怜,不仕而卒。(奚康生)太和十一年,从(柔玄镇都督李兕)为前驱军主。”按“入为镇北大将军”则意味着在京平城(今大同云冈石窟所在地)做官。又奚康生父不仕,故其父亲家亦当随其祖父也在平城。又按《魏书》,奚康生死于正光二年,“死时年五十四”。由此上推至太和十一年,奚康生当时是二十岁。此时离孝文帝把京城从平城迁至洛阳(太和十八年)还有几年时间,云冈石窟也还正在开凿。因为其家在平城,且当时崇佛风盛,奚康生应对云冈石窟有所了解,且永平二年(509年),他任泾州刺史时,距孝文帝迁都洛阳(494年),他成为“洛阳人”(见《魏书》)时,也不过15年,也不会忘记云冈石窟。又《魏书》载:“康生久为将,及临州尹,多所杀戮。而乃信向佛道,数捨其居宅以立寺塔。”凡历四州,皆有建置。”“康生于(洛阳)南山立佛图三层……”这说明,奚康生对兴造佛寺很感兴趣,故对云冈石窟这座他青少年时代就知道的佛教圣地,应有着更深的了解和特殊兴趣。

他应乐于采用或想到采用云冈模式，且乐于任用云冈工匠。同样他也应乐于任用其它那些对云冈石窟内容非常了解的工匠。因此他应能大胆采用云冈模式而加以创造，使得在石窟开凿史上，在泾水上游出现了一个崭新的新面貌。

二、最早洞窟宗教与政治意旨结合初探

上文已述，南、北石窟的开创与云冈石窟同是佛教大乘经典的反映。永平年间，全国各地的石窟也均如此。但南、北石窟开创时有所创新，故其反映内容的侧重发生了变化，有其自身的特色。除了反映北魏流行的《妙法莲华经》中释迦继过去诸佛出世，释迦入灭后弥勒出世和于一佛乘中分别说三的思想外，南、北石窟寺开创时洞窟内容的主要特点是突出了七佛。“七佛”指释迦牟尼与过去六佛，亦称“过去七佛”。东晋《增一阿含经》云：“七佛天中天，照明于世间。”并着重说明佛法是古已有之的。那么，南、北石窟大造七佛，在宗教上反映了歌颂佛教历史，歌颂佛教功德，巩固佛教地位、尊严和威力、加强佛教正统思想的传播和教化的要求。

一般来说，宗教同政治是紧密结合的。在很大程度上，宗教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佛教的某种创意，也往往反映了某种政治思想。如北魏文成帝复法后所开凿的昙曜石窟，相传为太祖以下五帝各凿一像。而实际也正相吻合。每窟为三世佛题材，环环相接，如同过去到现在五年皇帝的连续。这明显是借佛教宣扬皇权巍巍的地位。昙曜石窟开凿在云冈石窟的开创时期，相应地，南、北石窟的开创，由于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也似乎带有巩固、宣扬皇权的目的。属于南石窟第1窟的《南石窟寺之碑》上出现的“皇帝陛下”、“皇泽”，就说明了此窟为皇帝歌功颂德的意旨。那么，此七身佛分别为太祖以下七个皇帝所造，也是有可能的。因不包括被追尊的景穆皇帝拓跋晃和未做成皇帝（昙曜五窟也将他排除在外）的拓跋余，从太祖拓跋珪到奚康生当时的皇帝世宗宣武帝元恪正好七

位。且《魏书·释老志》云：“世宗笃好佛理，每年常于禁中，亲讲佛论，广集名僧，标明义旨。……上既崇之，下弥企尚。至延昌中，天下州郡僧尼寺，积有一万三千七百二十七所。”奚康生在这种有皇帝大力参予的宗教风气下，效法前代所为，禀“皇帝即当今如来”之义旨，为北魏七个正式皇帝造七佛是有可能的。这七如来中，如同“过去七佛”中有释迦牟尼一样，也有永平年间的皇帝世宗宣武帝元恪。这样可讨好皇帝，另外可起到巩固北魏政治统治，镇压反叛，安抚民众的作用。因为南、北石窟开凿的政治背景是：奚康生于永平二年奉命镇压了泾州沙门刘慧汪的造反^⑤。故开凿大型七佛窟有重申佛教历史，恢复佛教正法，消除沙门刘慧汪给佛教带来的恶劣影响，巩固皇权，巩固泾州平定后形势的目的。甚至政治目的大于宗教狂热。因为从《南石窟寺之碑》的碑阴文字记载看，泾州所有地方官都参予创建了南石窟^⑥。奚康生似乎不是把这件事作为一民间的宗教活动来做，而是把它作为一项“公事”或“官事”带动所有地方官员来做这件事。按《魏书》，奚康生在任泾州刺史时有“辄用官炭瓦，为御史所劾，削除官爵”之事。这也许正反映了他擅自以公家或官家的名义造石窟的情况。不然，仅凭个人（奚康生）出资以及地方官员象征性地赞助，造出两个大石窟，是较勉强的。而（官爵）“寻旨复之”^⑦或因他为皇帝造七佛，其罪得到宽谅。这从另一侧面也说明他与皇帝关系较密切。在《魏书》他的传中，皇帝经常对他恩宠有加，故他不怕犯罪，干心为皇帝造七佛的事是合乎情理的。

三、最早洞窟中两处碑文考释

1、《南石窟寺之碑》碑阴文字第三排有“终复袭爵者”文。按奚康生有“辄用官炭瓦，为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寻旨复之。”的情况。两文当互指。“辄用官炭瓦”之事，就是指开凿南石窟的事，否则不会在《南石窟寺之碑》上记载“终复袭爵”这一情况。且由此可见，

奚康生曾擅自以官方名义开凿洞窟。

2、北石窟第 165 窟中宋残碑载：“……泾州节度使奚侯创置……”

按《魏书》，奚康生死后曾被追封为侯。原文是：“又追封（奚康生）寿张县开国侯，食邑一千户。”故奚侯当指奚康生无疑。“奚侯”及“泾州节度使”非奚康生生前的称呼，乃宋人追记或借用后代官名之词。奚侯的确认，为我们肯定北石窟第 165 窟为奚康生所造，提供了有力文献证据。

综上所述，我们似可以做这样理解：南、北石窟最早的七佛大洞窟非偶然而成，而是北魏统治阶级自从文成复法后，利用佛教为政治服务的思想的一贯体现，是继云冈石窟之后的又一新形式。而且它又是特定历史时期（北魏宣武帝元恪时），特定历史人物（奚康生）独创且又尚未来得及推广的形式。自从元恪死后，北魏皇帝的数目增加，指导这种七佛大洞窟理论的现实实践基础便不复存在，故这种形式在北魏晚期并没有再流行。

注释：

①前者为文物出版社 1985 年版。后者见《考古》1983 年第 10 期。

②见上述二成果的考证。本文对此作保守估计。

③见《云冈石窟》（文物出版社 1977 年）载：“云冈石窟北魏分期表”所示。

④见③

⑤见《魏书》卷八，世宗纪。

⑥见《甘肃泾川南石窟调查报告》考察《南石窟寺之碑》碑阴题名的结论。

⑦见《魏书》卷七十三。

作者单位：麦积山石窟艺术研究所

特邀编审：张宝玺

敦煌写本类书概述

李冬梅 寒沁

敦煌写本类书残卷是敦煌文书中重要部分之一。在中国流传下来的类书中,最早的类书是唐代出现的《初学记》、《文艺类聚》、《北堂书钞》、《孔白六帖》四种,唐以前的类书原貌怎样以及它对唐宋类书的影响,敦煌文书发现以前无人知道,敦煌文书中保存有唐以前的类书残卷,P. 2526 号类书鸟部收有鹤、鸿、黄鹄、雉四类八十八则,据考是《修文殿御览残卷》,北宋初修《太平御览》,其体例完全承袭了《修文殿御览》的撰写体例,规模一脉相承,其余如标目、事类亦全部收入,故可以肯定地说,敦煌本类书是中国现存最早最原始的类书,反映了唐以前中国类书最原始状态。要研究中国类书从初创到完善这一过程,敦煌类书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类书体例不一,编撰形式复杂,有书抄体、语对体等,这些类书的原形都可以从敦煌写本中找到。书抄体有《修文殿御览》、《事林》、《类林》等。语对体有《攷金》、《语对》等。敦煌本类书卷号有一百十三余卷,六种体裁,四十三种书籍,内容丰富,所引许多古代典籍都是亡佚之书,如《修文殿御览》88 则中所引恨亡书籍四十六种,虽然编辑时任意删节、夺讹甚多,但据之尤能看出古代亡佚各种书籍大致面貌。如敦煌写本中有十余卷《梦书》,其体例就与《修文殿御览》引《梦书》、《事森》引《说梦》出入很大,说明古代梦书一种是单纯解梦,另一种是梦典。所以敦煌写本类书对于我们了解古代已亡佚的书籍体例、内容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关于敦煌写本类书内容,就其总体看,可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书抄胜类书。先分标目,后引诸经、史、子、集各书同类事典而附之,一般在各条目前或末尾都标出原书或出处,尽管原文删节甚大,但主体内容仍保留原貌。这类类书包括有:(一)P. 2526《修文殿御览》,残存鸟部四类 88 则,原卷前后残缺,罗振玉认为是《修文殿御览》,洪业认为是《华林遍略》,据我们研究应是《修文殿御览》,主要根据是本卷引用有《赵书》亦《后赵录》。(二)《励忠节抄》,王伯舆撰,敦煌文书中保存有 S. 1810、S. 1441、P. 3657、S. 5615、P. 4059、P. 5033、P. 2711、P. 4026、P. 3871、P. 2549、P. 2980 等十一个卷号,分忠臣、道德、恃德、德行、贤行、言行、亲贤、任贤、简贤、荐贤、将帅、安国、政教、善政、字养、清贞、公正、俊爽、恩义、智信、立身、谏诤、梗直、刑法、品藻、言志、嘲谑、试慎、阴德、廉卑、推让、家诫、教亲、志节、贞烈等部,一般为首尾残缺,唯 S. 1441 号中题“励忠节抄卷第二”。(三)《类林》,敦煌文书中保存有三卷——感应第二十四、报恩第二十五,为 Dx. 970、Dx. 6116 两卷号(残存);P. 2635 号残存工书第三十二、善射第三十三、壮勇第三十四、音声歌舞第三十五、美人第三十六、丑人第三十七,以及神异、怪异歌谣等,文中题“类林卷第九”。其与西夏文《类林》各类条目多寡上亦有一定差异。(四)P. 4052《事林》册叶本,共四叶。首叶封面题“君须立身,莫共酒家亲。员义□此《事林》一卷,点注看□。前题:“盖闻龙沙西裔,四面并是番戎。△乙闻明君则四方慕化,八表所以通欢”次页事类之前淡墨书题:“事林一卷”四字。员义为净土寺学士郎,名见 P. 2621 号长兴五年员义抄《渔父沧浪赋》。本卷《事林》抄勤学、劝学方面内容八条。有董仲舒、桓荣、朱买臣、□官、苏秦、路温舒、宁越等。(五)《事森》两卷,P. 2621 号首残、尾题:“《事森》。戊子年四月十日,员义写本故记。”S. 5776 号虽无书名,据所载六则故事与《事森》孝友篇所载条次、文字内容完全一致,当是《事森》

残卷。(六)《瑀玉集别本》，S. 2072 号首尾俱残，王重民定名为佚名类书，王三庆定名为《瑀玉集别本》。内容有音声歌舞、工书、善射、机巧、方术、善相、鉴识、医卜、占梦、高士、勤学、志节、儒行等。以本卷与《类林》相比较可以看出这是一部在《类林》基础上的改编本，篇目对应，行文体例一致、条目内容文字大体相同。然所引故事多处注明出自《类林》，说明本卷编写时参照了《类林》，而不是《类林》本。但行文叙事与日本真福寺藏本《瑀玉集》近似，故名《瑀玉集别本》。(七)《失名类书》，P. 3636 号与 P. 4022 号两卷。为未完成类书草稿，虽粗具门类，然编辑未完，文中处处留有校改痕迹及留白待书多处，当是熟悉的文士编校之类书。P. 5544 号《失名类书》册叶本，引故事 8 则，出《良吏传》、《独行传》、《春秋后语》等，为良吏酷吏内容。此类失名类书还有 S. 5725、Dx. 487、S. 6227 等号。(八)《勤读书抄》，P. 2607 号，卷首有“《勤读书抄》示额等，”当是某学士之读书札记，专录勤学内容。(九)P. 2612《新集文词教林》不分类，仅存上卷 220 则。(十)《新集文词九经抄》十七个卷号：P. 2557、P. 3621、P. 2598、S. 5754、P. 4525、Dx. 1368、Dx. 2153、Dx. 247、P. 4971、P. 3605、P. 3368、P. 4022、P. 3990、P. 3615、P. 3469、P. 3169 等。

第二、语对体之类书。每类之下，根据事文编成骈语对句，再附事典。这类类书残卷有：(一)《语对》，有 P. 2524、P. 2588、P. 4636、S. 79、S. 78、P. 4870 等 7 个卷号。(二)《羸金》，唐李弟立撰，敦煌文书存 P. 2537、P. 2996、P. 3363、P. 3650、P. 3907、P. 4873、S. 5053、S. 5604、S. 4195、S. 7004 号等十个卷号，唯 P. 2537 号题《略出羸金》，内有张球题记，当是敦煌文士张球改编本。各卷间体例亦各不统一，当是敦煌文士省删所致。(三)《失名对语》，P. 3956、P. 2678 两卷缀合，有天地、日月、玉、风云、雷电、烟雾、春、夏、秋、冬、帝德、瑞应等门类，每门以事类为对，后为范文叙例，有类于《羸金》体例，但部类微有不同。P. 3890 号首尾残缺，未立门类，分条编纂，辞